

池田大作
研究论文集

李桂林



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池田大作研究会

贾蕙萱
张可喜

主编

池田大作研究论文集

贾蕙莹 张可喜 主编

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2004年6月

池田大作研究论文集

编 者 / 贾蕙莹 张可喜

责任编辑 / 陈 韬

封面设计 / 李权民

发 行 人 / 韩方明

法律顾问 / 王盛军 wsj_law@sina.com

出 版 者 /  世经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香港金钟道 89 号力宝中心第 2 座 2006 室

电话: 852 - 2526 5338

传真: 852 - 2536 9223

电邮: hk_shibingshan @ sohu.com

排 版 / 龙浩国际交流出版公司电脑排版中心

印 刷 / 龙浩中国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 2004 年 6 月香港初版第一次印刷

I S B N / 962 - 620 - 099 - 5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Printed in Hong Kong

序 言

1974年5月,池田大作先生第一次应邀来中国访问,到今年整整三十年了。其间,为促进两国文化和教育交流,为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与友谊,池田大作先生和他领导的创价学会做出巨大贡献,在中日友好与合作方面,树立了一面迎风飘扬、光辉耀眼的旗帜。

多年来,池田大作先生与中国结下不解之缘。

池田大作先生同中国的缘分可以追溯到他的少年时代,即日本军国主义对外发动万恶的侵略战争的年代。他15岁时,四个哥哥相继被驱上战场,其中大哥先到中国大陆,后来转战缅甸,并在那里被夺去宝贵的生命。生前,他曾经告诉家人在中国战场上目睹的“日本太残酷”的情景。池田大作先生说,这句话一直萦绕在自己的耳边,无法忘却。不过,中国究竟是怎样的国家,中日战争究竟是怎样一回事,他当时是不会很清楚的。

接任创价学会第三代会长之后,1968年,到了“不惑之年”,他勇敢地发表了著名的《中日友好倡言》。应该说,这是他与中国结缘的开端,也是他战后长时期努力了解和研究世界和中国的历史与现状的结果。在复杂纷纭的国际政治当中,在长时期笼罩着反共、反华阴霾的日本,能够做出这样正确而果敢的决断,确实是件不容易的事情。这表明了池田大作先生在政治上的远见卓识,也说明了他思想的日臻成熟。

1974年12月第二次访华期间,卧病之中的周恩来总理不顾自身的安危,不听医生的劝阻,在医院里接见了池田大作先生,并与他亲切交谈,披露了“以平等互爱为根本的对世界人民友好的展望”,使池

田大作先生“从中窥视了以和为贵、自我抑制的礼让之美，及贯彻信念的坚忍不拔的意志”。在池田大作先生看来，这种无私奉献精神和克己自律品德与佛教的教义“普度众生”是完全一致的。作为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他不能被这伟大的精神所打动。为此，他在创价大学校园里种植了“周樱”（1975年）和“周夫妇樱”（1979年），以为对周总理的永久性纪念。从1979年开始，每当樱花盛开之时，创价大学就邀请中国驻日本的外交官、新闻记者、留学生以及其他来访中国朋友，举行“周樱观赏会”。其中最感人的场面，还是年轻学子们在“周樱”树下用中日两种语言朗诵池田大作先生创作的诗篇《樱花缘》，以倾诉对周总理的崇敬、赞颂和缅怀之情。二十多年来，这一纪念活动从未间断过。

诗的全文是这样的：

花落花开月缺月圆
世间风云多变幻
樱花因缘倍生艳
友好传万代
年年岁岁花满枝
亿万民众齐敬仰
日中青年手携手
热爱和平万年青
我亦衷心赞高德
友谊樱花万年长

周总理的伟大形象对池田大作先生的中国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池田大作先生的中国情结还缘起于对中国文化的真知灼见。

自古以来，中华文明就对日本社会的发展产生过极大的促进作用。在文化上，同许多有良知的日本人一样，池田大作先生把中国称

为“先生”，并且有非常浓厚的“知恩图报”情怀。他因此主张日中两国和人民应该世代地和平、友好与合作下去，对亚洲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做出贡献。不过，他的与众不同之处还在于对中国文化内涵有着深刻的了解与评价。

池田大作先生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尚文”的思想和传统。所谓“尚文”，就是爱好和平，反对战争，主张非武力主义和非侵略主义。

1984年第四次访华时，池田大作先生曾在北京大学发表了题为《走和平之康庄大道》的讲演。他在其中说，“我认为，中国三千年的历史给予我们很多启示。纵观中国历史，我有一个强烈的印象：与其说中国是一个‘尚武’的国家，不如说是一个‘尚文’的国家”，“与世界文明史中经历过盛衰荣枯的其它强大帝国相比，在中国历史中，很难发现单凭武力明目张胆地推行武力主义和侵略主义的例证。尽管一时性的武力主义也曾勉强推行过，但毕竟很快便为文化及文明那大海般的力量所吸收。中国被称为‘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在卷帙浩瀚的史书中，只消信手翻阅几册，就可发现其中处处充满着伦理性和伦理感。正因为中国是个‘尚文’的国家，所以才有可能产生这样的力量，抑制唯力是视的武力侵略主义”。池田大作先生认为，这种“尚文”的美德还表现在历史上周边国家对中国封建王朝的“朝贡”——朝贡外交、朝贡贸易等上：“当时中国对于绝大部分的从属国，只要求承认中国为宗主国，并不试图征服。所谓朝贡，亦即承认中国为宗主国，为了证明自己尽了臣下之礼而带着贡物来朝进贡。对此，中国的皇帝也赠送一些中国的工艺品作为回礼。这种朝贡制度，是当时一种特殊外交、贸易手段。这种朝贡贸易的出发点，在于以文明与文化使邻国心服。这种想法也是以‘尚文’思想与中华的自豪感为基础的”。他在援引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对中国的一段评价后得出的结论是，中国文明美的本质就在于“人或国家控制其自身本能和兽性的文明力量——亦即自制力或意志力”。然而，正是这一史实，多年来却被日本及欧美国家的专家学者们指责为“中华思想”最

有代表性的事例，甚至被认定为中国对周边国家有领土野心、“中国威胁论”的历史依据。

池田大作先生 2002 年为出版《池田大作讲演·随笔集》所写的序言中说：“我十次访问贵国，在和许多人交谈的过程中，对于贵国丰富的精神性，也可以称作‘共生的道德气质’，深铭亟深。”他进一步解释了“共生的道德气质”的含义，认为是“在比较温和的气候、风土里孕育出一种心理倾向，这就是取调和而舍对立，取结合而舍分裂，取‘大我’而舍‘小我’。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共同生存、相互支持，一起繁荣”。这也是以中国文化和传统美德“和为贵”思想为基础的，用现在的语言来表述，就是和平主义。

池田大作先生在与英国著名历史学家 A.J. 汤因比的对谈中说，“与其说中国人是有对外推行征服主义野心的民族，不如说是在本质上希望本国和平与安泰的稳健主义者。实际上，只要不首先侵犯中国，中国是从不先发制人的。近代以来，鸦片战争、中日战争、朝鲜战争以及迄今和中国有关的战争，无论哪一次都可以叫做自卫战争”。这是实事求是、没有偏见的结论。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国内虽然历尽盛衰兴亡，但是，对外实行军事扩张的事例并不多见，相比之下，遭受外来侵略的时候却不少。作为这一论点的左证，人们可以看到，在中国，无论南北东西，每家每户有院墙，座座城镇有城墙，在历史上，每个王朝几乎都要修筑长城。这种现象虽然被视为中国和中国人闭关锁国和保守的象征，但其最主要的动机与功能，还是自卫，而不是对外进攻。

池田大作先生是伟大的和平主义战士，因此，和中国的和平文明心心相印，一脉相通。

在当今世界各国的中国研究学者当中，池田大作先生的这种见地犹如凤毛麟角。许多西方学者常常有意或无意地忽视这些历史事实。

池田大作先生对于中国或许有某种偏爱，但是绝对没有讨好中国，没有不加思考、无原则地赞扬中国。他对中国文化采取了“是就

是是,非就是非”的态度,例如,对于“三纲五常”等儒家思想以及董仲舒“废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术国教化”等,就表示了异议,甚至作了这样的批评:中国封建文化“禁锢个人的创造性和自由、闭关锁国、固步自封的倾向也特别突出”。应该说,这一批评是一针见血的,没有反驳的余地。

池田大作先生期望“将来世界应该和平地统合,那时中国将起到主导作用”,深信“不仅在政治或经济方面,而且在联合人与人的‘友谊’哲学上,贵国必将引导 21 世纪的世界历史”(《池田大作讲演·随笔集》)，“从两千年来保持统一的历史经验来看,中国有资格成为实现统一世界的新主轴”(《展望 21 世纪》)。没有客观、公正的态度,不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这种认识是难以产生的。

池田大作先生这种正确的中国观,即尊重历史的精神或者态度,令人肃然起敬,值得认真学习。

作为一个佛教团体的领袖,池田大作先生自然精通佛教经典。他潜心钻研佛法,曾经撰写了《佛教对话丛书》四册,其中一册就是《我的天台观》。

在这本书的序言中,池田大作先生高度评价我国南北朝时期江南陈朝智顗(天台)的学识及其在佛教历史上的地位,称他为“中国杰出的思想巨人。其业绩不止于佛教界。‘一念三千论’等天台哲学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巨峰”,“天台立足于中国古来诸多思想和佛教思想的交汇处,使中国佛教形成一个能动的系统”,“出现于 6 世纪国家由动乱到统一时期的智顗将创始于印度的佛教从理论上集大成,牢固地奠定了东方哲学的基础”,“天台这样建立起来的理论体系,在近三千年的佛法史上始终保持着最高的水准。如果用中国的山来作比喻,会令人想到人迹罕到的昆仑山”,“释迦、天台、日莲,使佛教在传播过程中凝缩为其作为世界宗教被接受的要素,留下发展的系统”。

由此不难想见他在宗教思想方面所受到的来自中国的影响。

池田大作先生作为世界著名的和平主义者,为反对战争、争取和

维护世界和平、加深各国和各民族之间的相互了解与信任竭尽全力，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在国际社会赢得了极高的荣誉。

使用中国式的形容方法，池田大作先生称得上是位“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学者。他自幼博览群书，学识上博古通今，他的思想博大精深。他不仅对佛教经典有很深的造诣，而且对历史、政治、经济、科学等学问，都有独到见解，特别是在人生哲学、和平主义、教育等方面，更是确立了自己的系统理论。他无愧为日本佛教界乃至世界佛教界杰出的一代宗师，也是中国人民忠实可靠的朋友。中国学者有理由认真地研究池田大作思想，以促进中日两国和人民的友谊与交流。

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于2001年设立池田大作研究会，正是出于这个目的。

本论文集是为纪念池田大作先生首次访华三十周年而出版的一部学术性著作，是我国学者近来研究池田大作思想的最新成果。

刘德有先生在池田大作先生与中国结缘方面是位不可忘怀的人物，又是北京大学池田大作研究会的顾问。因此，本集把他的《从池田大作先生讲演说起》放在首篇。

以生命尊严、自我变革为核心的人本主义人生论和以反对战争、维护和平为主要内容的和平主义是池田大作思想中闪耀光芒的两大亮点。有关这方面的内容在论文集里占据了最多的篇幅。其中有关人生论的论文四篇，它们是贾蕙莹的《池田大作人生论探究》、刘光宇的《试论池田大作的人生哲学》、王伟英的《池田大作的生命论》和冉毅的《论池田大作的“生死不二”人生观》；论述池田大作和平主义的有三篇，它们是高海宽的《世界和平的积极倡导和维护者——浅论池田大作的和平主义思想》、丁斗的《浅论池田大作的和平观》和冯昭奎的《池田大作：祈愿和平的世界》。

关于创价学会的论文有三篇，这就是王新生的《创价学会·社会功能·池田大作——以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为中心》、贾蕙莹的《公与明

——从朝野两个视角看创价学会》和董武的《创价学会与中日友好》，立足于更宽广的视野探讨了池田大作思想。

张可喜的《佛教历史上杰出的一代宗师——浅析池田大作的宗教观》、郭刚的《池田大作的佛法论初探——〈佛教对话丛书〉之管窥》是从宗教观方面对池田大作思想所做的初步探索。

贾蕙莹的《池田大作的教育思想》和《池田香峰子——在平凡中闪烁着美丽的女性》、李燕的《池田大作其人——不凡的生平、事业和风范》三篇论文也从不同的角度做了介绍，有助于读者更全面地了解池田大作思想。

日本创价大学高桥强教授的论文《〈人生地理学〉与中国》对创价教育学会的创始人牧口常三郎和他的名著《人生地理学》与中国的关系作了相当深入的研究，是一篇难得的佳作。张昌玉的《牧口常三郎与〈人生地理学〉》可以称得上是它的姊妹篇，着重介绍了《人生地理学》，能够使读者对创价学会的创始人牧口常三郎有比较全面的了解。

王保祥的《爱心》虽然不是研究论文，但是体裁别具一格，内容也好，因此，被排在“压台戏”的位置。

论文集的出版如果能够促进我国读者对池田大作先生这位中国人民的好朋友、老朋友和他的思想有进一步的了解，有助于更多的学者参加对池田大作思想的研究，那将是我们最大的荣幸。

本文集贯彻“文责自负”的原则，一些日文的译法也没有强求统一。

如有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编 者

2004年5月

目 录

序 言	(1)
从池田大作先生讲演说起	刘德有(1)
池田大作人生论探究	贾蕙萱(14)
试论池田大作的人生哲学	刘光宇(31)
池田大作的生命论	王伟英(46)
论池田大作的“生死不二”人生观	冉 毅(69)
世界和平的积极倡导和维护者 ——浅析池田大作的和平主义思想	高海宽(107)
浅论池田大作的和平观	丁 斗(124)
池田大作:祈愿和平的世界	冯昭奎(135)
佛教历史上杰出的一代宗师 ——浅析池田大作的宗教观	张可喜(157)

池田大作的佛法论初探

——《佛教对话丛书》之管窥 郭 刚(170)

池田大作的教育思想 贾蕙萱(182)

池田大作·创价学会·社会功能

——以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为中心 王新生(195)

公与明

——从朝野两个视角看创价学会 贾蕙萱(209)

创价学会与中日友好 董 武(221)

池田大作其人

——不凡的生平、事业和风范 李 燕(231)

池田香峰子

——在平凡中闪烁着美丽的女性 贾蕙萱(250)

《人生地理学》与中国 高桥强(261)

牧口常三郎与《人生地理学》 张昌玉(274)

爱 心 王宝祥(283)

从池田大作先生讲演说起

刘德有

具有历史意义的讲演

1968年9月8日傍晚,我正在东京涩谷区惠比寿的中国记者办公室收看电视新闻,其中有一则报道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播音员清脆的声音报道说,创价学会这一天在东京日本大学讲堂举行第十一次学生部大会,池田大作会长向一万数千名出席者发表演说,其中谈到日中关系问题。由于当时世界正处于冷战时期,日本佐藤政府一味追求美国,与广大中国人民为敌,死抱住“日蒋条约”不放,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从而为中日关系正常化设置了种种障碍。因此,池田大作的讲演引起了各方注目。

由于创价学会事前没有通知中国驻日记者去采访,所以我们不知道有这一活动。第二天早晨,我们从日本几家大报上看到较为详细的报道。全文是从稍晚一些时候收到的《圣教新闻》上看到的。池田先生在演说中谈了许多问题,其中包括宗教教义。

关于中国问题,他在演说中是这样说的:

在这里,我想谈一谈中国问题。关于中国问题,人们早就说越南战争一旦结束,下一个焦点就是中国。但是,从越南和捷克斯洛伐克当前的形势来看,也许有人会说现在你

来谈论中国问题未免不合时宜。然而从日本的处境来说，或迟或早，中国问题是绝对回避不了的。

我作为始终站在这一立场上的日本人，作为一个渴望未来和平的青年，愿意和诸位一起来思考这个问题。

接着，池田会长对亚洲和世界形势作了分析。尽管他的观点出自他的立场，与我们并非完全相同，但是他强调不能在国际事务中排除中国，如果不能像对待其他国家一样来平等地、公正地对待中国，那么就不可能实现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他说：

为此，需要做什么呢？第一是正式地承认中国政府的存在；第二是在联合国（为中国）准备好正当的席位，使她登上国际讨论的平台；第三是广泛地推进经济文化交流。

现在，对于把自己封闭得很紧的中国来说，手中握着最有力的钥匙的，无论从历史传统、地理位置，还是从民族的亲近性来看，只有我们日本，而绝不是其它国家。然而，现在日本进入了中国最讨厌的美国核保护伞下，日本既不承认中国政府，也不同她恢复邦交。不仅如此，贸易额也在逐年减少。

日中两国至今尚未消除那场战争的伤痕。但是，战后却已经过了 23 年。……

不久的将来，当你们成为社会的核心力量的时候，日本的青年和中国的青年理应携起手来，充满欢笑，努力建设光明的世界。以日本和中国为基轴，亚洲各国的民众互助互爱，到那个时候，就会吹散今天笼罩在亚洲上空的战争的残酷和贫困的乌云，而充满希望和阳光明媚的时代就会到来。

我绝不是共产主义的礼赞者。我也知道，而且也感到许多善良的日本人对于中国的做法表示担心和持有戒心。但是我想说，从国际社会的动向来说，为了亚洲和世界的和

平,我们必须同任何国家都要友好。……

……不解决中国问题,就不能说真正地结束了战后。

……中国是一个拥 71000 万人口的大国,而且是一个具有三千多年历史的伟大民族。他们的思维方法是非常复杂的,简单化地对待她,就会走进死胡同。如果性情急躁地小小气气的行事,就会犯大错误。

我想强调说,在解决复交、联合国的代表权以及日中贸易等问题的具体事项时,要充分地把握这一前提,掌握这一知识,立足于长远的观点,耐心地进行谈判。

首先,我想谈日中邦交正常化的问题。日本政府的立场是:1952 年同台湾的国民政府之间签订了“日华条约”,由此,日中媾和问题已经解决。但是,这种说法不过是一种唯心主义论调,它无视中国大陆 71000 万民众,好像他们并不存在似的。

所谓邦交正常化,只有国民与国民之间相互理解,相互交流,相互增进利益,并为世界和平作出贡献,才有意义。因此,关于日中邦交,其对象的实体也在于中国 71000 万民众。无视它,而只拘泥于条约的“大义名分”,怎样说它是言之有理的,也不能不说那是荒诞的。实际上,周总理等中国首脑一贯认为中国和日本的战争状态尚未结束。在这种状态下,不管日本怎样说战争状态已经结束,也不可能建立圆满的邦交关系。因此,我认为日本政府必须同北京政府进行会谈。

……解决日中两国间的问题,如果按过去那种归纳法的做法,即通过搞耍小聪明的外交,或者先解决细节问题,最后导致邦交的恢复,那么不管付出多大的努力,都会失败。我主张,不如两国总理、两国的最高负责人通过对话,确认对待和平的基本共识,从对大局的看法,从基本方针政策入手,加以落实,然后再涉及细节问题。按照这种演绎的

方法进行，才是解决问题的捷径。

如果日中两国首脑能够不屈不挠、反复多次地采取向前看的态度进行谈判，那么不管有多大困难，也一定会出现解决问题的光明前景。但是，现在佐藤政权显然没有此意，而中国也不理睬佐藤政权。为了解决这一难题，我希望包括公明党在内的在野党团结一致，把这一任务承担起来。

池田会长预见到，这样做，将必然遭到台湾和美国的强烈反对。但是，他说这决不是要“离开”台湾和美国。他说，“日中邦交正常化，不仅有利于日本，而且是世界的客观形势赋予日本的使命”。

池田会长接着谈了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他认为，这个问题说到底是谁代表全中国。由于国际社会支持中国的国家越来越多，美国想了一个老奸巨滑的对策，要联合国采取“重要事项指定方式”，进行阻挠。但尽管如此，世界舆论的大势越来越倾向于支持中国。实际上，发达国家中承认中国的国家逐渐增多，通晓国际事务的人们说，“再过四、五年，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将归于北京”。池田会长说：

我国的自民党政府一贯追随美国。但是日本既然也是一个独立国家，拥有独立的信念，推进自主的外交政策，是理所当然的权利。如果我们想到日本跟中国有两千多年的密切关系，认识到日本当前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再进一步想到未来的亚洲与世界和平的理想，那么一成不变地把这一态度坚持下去是不行的。

1968年秋，要举行第23届联合国大会，日本不应该像过去那样加入美国的重要事项指定方式的行列，而应当积极推进北京（恢复）在联合国的代表权。把占地球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实质上从联合国排除出去，对于这一现状，任何人都会认为是联合国的重要缺陷。我认为，解决这一问题，

才体现了真正的联合国中心主义，对世界和平作出了伟大贡献。

他谈的第三个问题是日中贸易问题。他强调：

日中贸易，只有在日中两国相互理解的基础之上才能成立。因此，不能单方面地无视中国方面的主张。关于这一点，中国曾两次提出了对日三原则。

第一个三原则是 1958 年 5 月，在长崎发生所谓侮辱（中国）国旗事件时中国提出的，被称为政治三原则。其内容，第一是日本不采取敌视中国的政策，第二是不参与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第三是不阻挠为恢复邦交所作的努力。

另一个三原则是贸易三原则，它是由于发生国旗事件使日中贸易中断以后，于 1960 年 8 月又出现新动向表明日中贸易要恢复时，中国方面提出来的。贸易三原则不像上述政治三原则那样对日方提出了要求并予以制约，它是把日中贸易的途径分为三个阶段，其意图可以认为是要推进日中贸易的。

池田会长在介绍了日中备忘录贸易产生的经过以及日中贸易的现状后说：

然而，日本政府对日中贸易的态度如何呢？它把日中贸易交给财界的有识之士去搞，而自己却采取完全消极和旁观的态度。不仅如此，它还顽固地坚持中国所反对的“政经分离”原则，并追随美国，死死地守住巴黎统筹委员会的（对华）禁运货单，对中国实行种种限制。日本政府之所以这样做，是由于美国敌视中国，“日美安全条约”是以中国为最大的假想敌人的缘故。